

《三略》原称《黄石公三略》，相传为汉初隐士黄石公所作。全书仅3000余字，分上略、中略、下略3个部分。它援引已佚古兵书《军藏》《军势》的内容，为后世保留下两部失传兵书的部分精华，又兼收诸家思想，跳出先秦兵书主要聚焦战术的局限，集中探讨治国安邦、驭将安民等深层战略问题。北宋年间，《三略》被纳入《武经七书》，成为古代官方权威兵学经典。

《三略》以《上略》为纲领，开宗明义地打破了先秦兵书“重术轻道”的局限。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论战略的兵书，《三略》与前代兵书不同，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，这也正是占全书一半以上篇幅的《上略》的核心主旨。它开篇就提出“主将之法，务揽英雄之心，赏禄有功，通志于众”，把争取人心、凝聚共识放在所有战略布局的首位，打破了此前兵书重作战技巧、轻政治根基的传统。它明确反对穷兵黷武的扩张战争，主张“以义诛不义”，认为正义之战若能得到民众广泛支持，便会如堤决水涌，势不可当。

《三略》

揽心崇义 安民固本

■任晓宁

《中略》则聚焦军队上下的权责分配，系统阐释了立威、驭下的辩证关系。它提出“将者，能思士如渴，则策从焉”，强调将领唯有与士卒同甘共苦、尊重麾下人才的智慧，才能让全军上下同心追随。其还强调“谋可深而不可疑”，警示将领决策时须深思熟虑、定策后坚决执行，避免犹疑涣散军心。该书还明确划分了治理层级：将领以威信统领军队，各守其位、各司其职，让指挥体系始终保持高效顺畅。

若说《上略》立其纲，《中略》明其术，那么《下略》则归其本。《下略》以“陈道德，察安危，明贼贤之咎”为核心，将治理的落点回归到仁德与民心的根本上之。它开篇便直言“能扶天下之危者，则据天下之安；能除天下之忧者，则享天下之乐”，把执政者的责任与天下人的福祉牢牢绑定。书中强调“废一善，则众善衰；赏一恶，则众恶归”，警示执政者必须尊贤远佞、赏罚分明，唯有让贤能之士各尽其用，才能实现“贤人所归，则其国强；圣人归之，则六合（即天下）同”的安定局面。它还提出“人乐其家、人乐其业、人乐其郡邑”的治理目标，认为真正的安定要让民众发自内心地安居、乐业、认同国家。

综览《三略》，其思想精华并非止于“爱民”“揽贤”等孤立主张，而在于其构建了定战略、明方法、强根基的完整体系。时至今日，《三略》中这种整体考虑问题的战略智慧与治理思想，仍有着一定的现实价值。天下之安，不在城郭之固，而在耕桑之乐、室家之宁，而要实现此目标，则需要上下同心，将士各安其位，更需要凝聚民心、尊贤富民，不断强化自身实力，共同守护国家主权与安全。

镌刻在万水千山的“红色印记”

——回望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工作

■周 一

“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。”在红军长征的壮阔征程中，报纸、布告、标语等多种载体，共同构成了部队宣传工作的主要依托，也成为长征文化中极具分量的组成部分。红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，在沿途广袤土地上播撒下无数红色革命火种，为突破敌人围追堵截、夺取革命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时至今日，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珍贵宣传史料，依然是我们回溯长征历史、感悟初心使命的生动鲜活教材。

长征途中，红军宣传工作始终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推进，而面临着诸多现实考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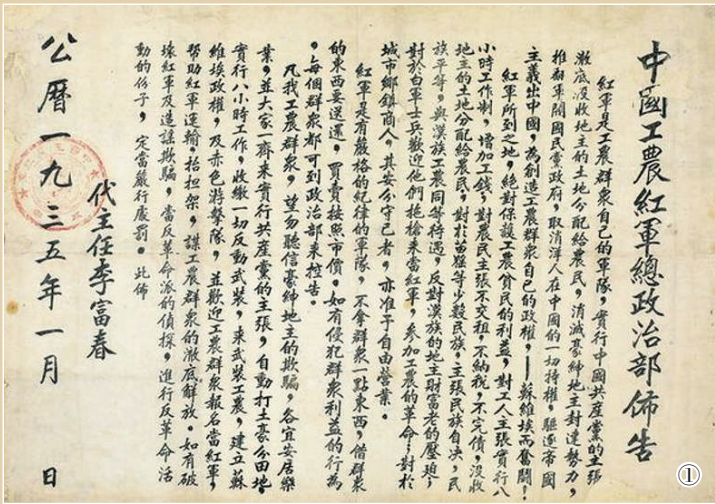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是行军环境的极端恶劣。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例，在一年多时间里纵横10余省，翻越多座人迹罕至的高山，跨过湘江、乌江、赤水河、金沙江、大渡河等多条河流。高强度的连续行军，对官兵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状态都构成极大挑战，筑牢部队战斗

信心自然成为宣传工作的重要职能之一。

其次是军事斗争的空前残酷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总兵力有8万余人，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后仅剩3万余人。漫漫征途中，红军头顶有敌机侦察轰炸，四面遭反动军队围追堵截，宣传工作必须时刻聚焦坚定官兵斗争意志，才能为部队突出重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。

再者是群众工作的客观需要。当时，受国民党长期反动宣传蛊惑，沿途不少地区的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存在很大误解，个别不明真相的群众甚至还向红军队伍放“黑枪”。通过扎实有效的宣传，让群众准确了解党和红军的群众政策、民族政策，争取最广泛的理解与支持，自然成为宣传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。

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，不同的宣传载体因地制宜发挥作用，形成了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的宣传格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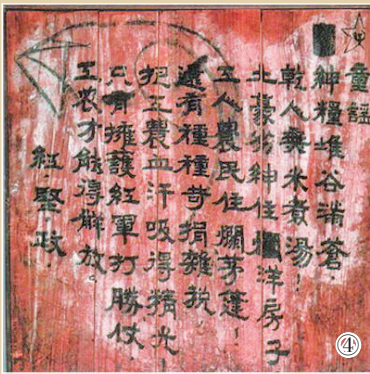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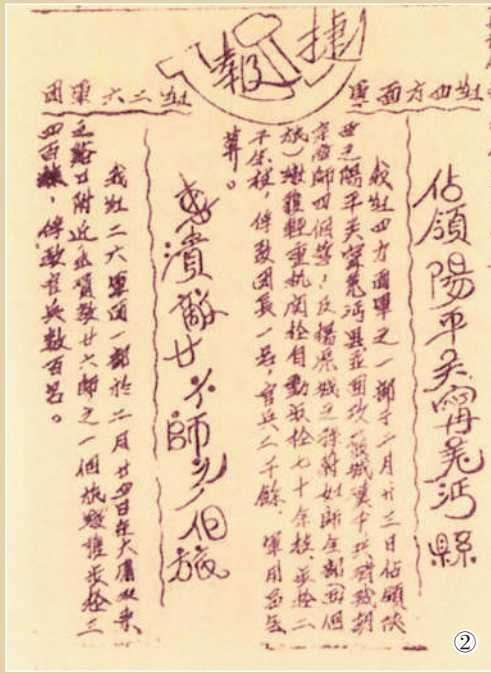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①：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》。

资料照片
图②：长征期间，红军出版的部分庆祝报纸。

资料照片
图③：红军抗日宣传画。

资料照片
图④：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仁怀留下的木板标语。



物资补充、卫生防病等实际问题普及知识、传授技巧，助力部队持续保持战斗力。针对部分官兵出发前准备不充分、缺鞋少袜甚至赤脚行军的情况，1934年11月14日的《红星》报专门刊发《怎样解决草鞋问题》一文，明确指出“解决部队中的草鞋问题，在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上，占着重要的位置”，并在同期报纸中列出多条保障草鞋供应的具体可行办法。

部队进入川西地区后，筹粮难度陡然加大，《红星》报随即刊发《为筹集充足的粮食而斗争》等文章，推广部分单位筹粮的成功经验，动员和指导各部队顺利完成筹粮任务，为穿越草地做好充足物资准备。长征途中，不少战士患上疟疾、痢疾、夜盲等疾病，加上长途跋涉中跌打损伤、肌肉劳损频发，《红星》报、《健康报》便持续刊发各类卫生常识，详细介绍多种常见病的预防和处置方法，为官兵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。

二

当需要向群众郑重宣示政策主张时，布告就成为最具公信力的“红色名片”。作为一种正式规范的宣传方式，布告通常以中共中央、中革军委、红军总政治部或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发布，张贴在集镇圩场、交通要道等群众密集区域，既能快速把党和红军的政策广而告之，更能以公开承诺的形式接受群

众监督，起到“徙木立信”的重要作用。

1935年1月，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后，第一时间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布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》，既广泛宣传党主张的主张，号召广大青年踊跃参加红军，又将“不拿群众一点东西”“借群众的东西要还”“买卖按照市价”等红军纪律条款全部公之于众，明确告知群众“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，每个群众都可到政治部来控告”。这份布告让遵义城内的老百姓迅速对红军形成了直观、良好的印象，大家不仅真心拥护党、红军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，还主动捐粮捐物，不少青年直接报名参军。

1935年5月，中央红军进入川西彝族聚居区。为消除民族隔阂，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摩擦，红军以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，不仅用通俗语言宣讲党的民族政策，明确提出“一切彝汉平民，都是兄弟骨肉”，还首次公开阐释“设立彝人政府，彝族管理彝族”的民族区域自治主张，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同和全力支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份布告中明确写下“红军万里长征，所向势如破竹”，“万里长征”这一广为人知的表述也由此正式流传开来。

三

要实现随时随地、全覆盖的政策传递，标语就成了最接地气的“流动宣传

员”。和报纸、布告相比，标语制作更简便、传播更广泛，几乎不受物资和场地限制。红军官兵大多用刷子、油漆在墙壁上书写标语，物资匮乏时，小刀、毛笔、煤块甚至石头、竹片都能成为书写或雕刻的工具，书写载体也不局限于墙壁，行军沿途遇到的大石头、树木、石碑、牌坊，都能成为传递革命主张的宣传阵地。

1935年2月27日，为进一步扩大标语宣传的覆盖面，红军总政治部专门下发《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的命令》，要求“立即动员自己各部队中凡能写字的，用木炭，用毛笔，用大字，用小子。在墙壁上，在门板上，编写下列材料十二条，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。从连队到军队的军队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，写满整个宿营地”。命令下达后，部队官兵迅速行动起来，掀起人人动手写标语、宿营地处处是标语的群众性宣传热潮。

从内容上看，红军标语几乎涵盖了当时我军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。有面向内部鼓舞士气的，比如“打大胜仗，消灭大量敌人，创造大的苏区”；有面向群众宣传党的群众政策的，比如“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”“汉苗一家，汉苗平等”；有面向国民党军官兵开展瓦解工作的，比如“红军官兵对士兵又和气又亲热，白军官兵对士兵又打又骂”“反对白军官兵克扣军饷”；还有面向全社会宣传抗日主张的，比如“白军兄弟和红军一起北上抗日去”“不打抗日红军，哗变拖枪当红军打

日本”，一条条简短有力的标语，把革命主张送到沿途每一个角落。

四

为了让不识字的群众也能看懂革命道理，漫画就成了跨越语言障碍的“无声宣传员”。长征途经的不少偏远地区，群众长期受地主、军阀压迫，生活贫困，文化程度不高，很多县城里识字的人寥寥无几。针对这一情况，红军在刊发新闻、书写标语时刻意追求文字简洁明了，同时搭配生动形象的漫画进行辅助解读，让不识字的群众也能一眼看懂其中含义。比如在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题漫画中，就用“锤子镰刀”的形象代表北上抗日的红军队伍，路边群众手中挥舞的小旗上写着“打倒军阀”“打倒侵略者”等字样，生动勾勒出军民齐心、共御外辱的浓厚抗战氛围。

回望长征，党的宣传工作内容丰富、影响深远，既为部队官兵筑牢了坚定的理想信念、激发了高昂的战斗士气，也为党带领红军冲破千难万险、开创中国革命崭新局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。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，无数宣传工作者凭借手中的“十八般兵器”，施展“十八般武艺”，坚持实事求是、勇于开拓创新，正是这份扎根实际、服务群众的初心，让长征时期的宣传工作穿越时空，至今仍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

你死我活的白刃格斗。他们用刺刀捅、用枪托砸、用拳头击打，甚至用牙齿撕咬，接连毙伤多名日军。

惨烈的拼杀中，5名战士相继倒下，鲜血浸染河畔热土。剩下两名战士边打边撤向阵地西侧，但因伤势过重没能摆脱敌人。他们又奋力刺倒4名日军，一直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。

日军登岸后才发现，抗大主力早已安全转移，阵地上只剩下7名壮烈牺牲的战士。气急败坏的日军纵火焚烧燕子阁，又惧怕新四军主力回师反击，不敢久留，在傍晚时分仓皇撤回沙沟、秦南仓据点。

这7名战士牺牲时平均年龄仅18岁，他们以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热血，谱写了一曲保卫家国、气吞山河的壮歌。因没有留下具体姓名，当地群众统称他们为“燕子阁抗战七烈士”。

烈士事迹从未随河水流逝而湮没，经突围的抗大学员与幸存的群众口口相传，迅速传遍盐阜大地，极大激发了广大民众抗战到底、抗战必胜的信念。

1961年，当地群众自发筹资投工，在蟒蛇河畔建成燕子阁抗战七烈士纪念碑。如今，这里已是盐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每逢清明节、烈士纪念日，当地都会举行纪念活动。苍松翠柏间，一代代年轻人手捧白菊肃立碑前，从滚烫的英雄故事里接过薪火，把七烈士用生命守护的这片水乡，建设成了河清岸绿、烟火安宁的幸福家园。

水乡咽喉，七勇士血战日寇

■刘秦阳 郭大伟

在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楼王镇的蟒蛇河畔，一座近10米高的纪念碑静静矗立了60余载。碑身正面“为国牺牲 永垂不朽”8个大字苍劲庄重，背后镌刻着一段被芦苇荡与河水共同守护的悲壮往事。1941年，抗日军政大学第5分校的7名战士，为掩护群众和大部队转移，在燕子阁的河口前浴与数倍于己的日军浴血奋战，最终全部壮烈牺牲。他们就是被列入第三批著名抗日自卫队、英雄群体名录的燕子阁抗战七烈士。

燕子阁位于楼王、北龙港、义丰、学富四地交界处，蟒蛇河、仇垛河、池沟河三河在此交汇，是扼守楼王镇城东南的水上交通咽喉，也是楼王抗日根据地通往敌占区沙沟、兴化一带的重要门户。

1941年3月2日，一股日军乘汽艇从沙沟沿北宋庄蟒蛇河北上，准备发起“扫荡”。彼时，抗日军政大学第5分校的32名官兵正在燕子阁周边执行任务，得知日军即将进犯的消息后，指挥员立刻作出部署：一部分人进村组织群众紧急疏散转移，另一部分人抢占河口的有利地形设伏，准备阻击来犯之敌。

官兵刚持枪进入阵地，敌人的汽艇便出现在河面。日军以为这一带早已被



燕子阁抗战七烈士纪念碑。 资料照片

反复“扫荡”，戒备松懈，汽艇开得快，在水面激起层层白浪。

待敌艇完全驶入伏击圈，指挥员一声令下，阵地上步枪齐射，子弹呼啸着扑向敌艇。突如其来的打击把艇上日军打蒙了，他们想依托汽艇还击，却根本找不到目标。河岸边芦苇随风摇曳，枪声忽东忽西，我军官兵打完一个点射便迅速

转移阵地，借着水网地带交错的水道与沟汉，转瞬隐入茂密的青纱帐之中。

日军在混乱中难以支撑，只得将汽艇依靠在蟒蛇河东岸，数名日军慌忙爬上岸，龟缩在圩堤之下，用机枪向两岸疯狂扫射，妄图以火力压制掩护汽艇强行冲向燕子阁阵地。密集的子